

刘复生

历史小说的转折与《张居正》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纯文学”读者的渐趋流失,历史小说却“逆势”而上,成为文学出版和影视改编的宠儿,收获了远超以往的读者数量,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乃至问鼎茅盾文学奖。至上世纪90年代以降,历史小说则以越来越自觉的方式,用文学精准把脉社会现实,借追寻历史真实的名义,维系着文学与现实的对话,并发展出了越来越成熟的讽喻技艺,在自觉不自觉间,以隐喻的形式构成了和现实的对位和应答,由此,历史小说在赢得更大自由空间的同时,亦从历史中汲取了批判性资源和思想启示,打开了理解现实的另外可能。

当关注现实的“80年代精神”在90年代的“纯文学”主流退潮后,表面上离现实最远的历史小说反倒不改初心,将现实主义的文学品格接续了下来。其实,在新时期之初,历史小说就已充当了改革文学的侧翼,一直配合着主流的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摇旗呐喊。当然,

来就别有意味。

写张居正其实就是在写改革。作为有明一代最具权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于十年间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尤其是对吏治的整顿,他采取了“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提高了国家机器的行政效能。“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财政上,他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一举扭转财政赤字,使国库充实,“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在军事上,他主张任用良将戚继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等安定北方,平定西南叛乱,保证了内外稳定。可以说,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极大地将明中期以来的颓势予以了某种程度的挽回,并使大明王朝呈现出难得的中兴局面。然而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新政所奠定的局面却未能延续,明王朝的国运也急转直下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另一方面,尽管“万历新政”的效果明显,但对于张居正的政治作风及其私德历史上也存在不少争议,尤其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几成公论。对这样一位复杂的改革家及其功过,上世纪90年代的熊召政又是如何进行书写的呢?

重要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根据熊召政的自述,他写作《张居正》的诱因就是1992年的新一轮改革热潮。“我写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背景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当时我在深圳,看了《晚间新闻》的播放,《人民日报》那时也刊发了社论《东方吹来满眼春》。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改革要出现第二个高峰了。当时有朋友问我,‘你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改革成功的案例?’我想,改革的意义对历朝历代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改革也是一个学者的使命。此后,我便开始寻找历史上的改革案例,着重研究了张居正。”(参见《熊召政:从张居正到大金王朝》)

小说酝酿和写作的10年间(从1993年至2002年),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矛盾也陆续呈现,现代化思潮开始出现分化,改革初期的期待和想象成为了某种“过去时”,新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表现出一些实用主义的气质。随着改革越来越步入“深水區”,改革的精神也产生了某些深刻变化。诞生于此时的小说《张居正》,一方面试图借助作品来展露作家对新的改革时代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以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原则来重新诠释和反思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路径,这既是一次以艺术方式

进行的统合历史、弥合历史张力的努力,又是一次意义含混、歧义重生的表意实践。

不可否认,小说《张居正》呈现出了多重面相。在思想资源上,熊召政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式的“新启蒙主义”的思维框架中,对制约改革和现代化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仍是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就使得小说在主要戏剧矛盾关系的设置上仍旧延续了“改革—保守”相对立的模式。小说前两部的故事主线类似于新时期的改革小说:“右派”市长或厂长归来,努力争取上级和同僚的支持,压倒保守派的掣肘,应对各种捣乱,任用内将,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化解危机,赢得胜利。《张居正》与此类似,只不过他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的是高拱及其余党。对张居正来说,一项首要的工作就是争取皇权的支持,他必须维护好和李太后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同盟关系。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反封建”态度。显然,在熊召政看来,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力思想和特权意识即是制约改革推进的重大阻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月河和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中,这样的文化焦虑已不再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已摆脱了新启蒙主义框架性的约束,“文明论”已上升为作品的核心主题。而对张居正来说,改革的阻力既来自保守力量和政治反对派,亦来自历史积弊所产生的封建利益集团间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比如在正在崛起的地方势力和商业力量等。面对复杂的利益格局,脆弱的“万历新政”一直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中,所以张居正才不敢丁忧三年,而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夺情起复,维护宝贵的改革成果。或许张居正所要改革的积弊,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所期望的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指向。在他看来,改革所陷入的某种困局需要重启改革来化解,这些在上世纪90年代显露出的官僚主义、地方主义、贪腐现象以及新兴的资本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等,都需要国家力量的强力解决。理解了这一层现实忧虑,我们或许就能对小说中很多重要情节的意味产生更多的会心理解。比如那大员承包重大工程却偷工减料造成重大事故,又如地方势力的代表李廷的贪腐案,伺心隐等所代表的“私学”的挑战等。

张居正是依靠法家力量来推进和深



熊召政

化改革的。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定影响的“新权威主义”也存在某种呼应。“万历新政”的法家气质鲜明地体现在张居正重用循吏、不用“清流”的用人方式上。小说中,张居正不断地以夫子自道表达自己的改革观,这表明张居正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或曰功利主义的改革家,他反对清流所代表的“空疏无用”的道德激情和理想主义。为了巩固改革成果、为了富国强兵国家至上的目标,他可以不惜手段,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即使牺牲某些儒家原则也在所不惜。他对循吏的要求是勇于任事、敢想敢干,达到上级要求的目标即可,即使有些违规和贪墨也只是“小节”而已,可以接受。应该说,这种想法在上世纪90年代曾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方面,它反映出人们渴望深化改革的诉求,对打破现实羁绊、不墨守陈规的探索精神的期望;另一方面,这种功利主义也放松了理想引领,给道德约束松了绑。不难看出,当时一度流行的反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观念对作者还是有着某些潜在影响的。

小说《张居正》中出场人物众多,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明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场景和风貌,在叙事状物和刻画人物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作者对明代典章

制度、文人趣味和市井风情的描画也显示出一定功力。相对于彼时开始流行的偏传奇的写作路线,如历史小说中常见的武侠、言情套路、宫斗情节等,小说《张居正》还是显露出了作者反思历史并折射现实的思想抱负和艺术追求。虽说小说中对欲望场景的描述有些流俗并显现出某种把玩的趣味,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可以看作对晚明社会人欲横流时代的某种文学再现。小说中设置了多条叙事线索,如张居正和玉娘的爱情,万历皇帝的权力型人格的成长,以及张居正性格的异化等,通过这些线索,小说既试图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也试图传达出更为丰富的“人性”内容,小说努力寻求表达的仍是“纯文学”关注的某些主题和深度思考。然而,对于此后的历史小说来说,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需要刻意背负这些文学“包袱”了。比如《大秦帝国》中,孙皓晖关心的只是以小说这种文体表达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对文学的惯例和“陈规”已不再措意。从这些方面来看,小说《张居正》无论从主题、思想观念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可看成是一部具有标志性的处于转折期的历史小说,此后,甚至在它写作的同时,历史小说的写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总的看来,80年代历史小说的核心主题是追求现代化。不同于此前历史小说对农民战争等题材的书写热情,此时的历史小说题材一转而成为了聚焦历史变革的“改革小说”,其基本模式或是讲述晚清以来的历史危机,或是批判“封建”王朝的体制弊端,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告别落后停滞的封建社会,我们才能启动新的历史时间,进入新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时空。因此,这类作品往往会出现出更为鲜明的“新启蒙主义”的批判性和强烈的“历史目的论”色彩,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少年天子》和《白门柳》就体现出了这种特征。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改革主题的历史小说开始式微,至90年代中期,此类小说逐渐被新的“文明论”主题的作品所压倒取代。但小说《张居正》却延续了对改革主题的书写,其创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集结出版于新世纪初,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创作看起



熊召政(1953~),湖北英山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等职。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协。长篇小说《张居正》曾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小说奖、第五届屈原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等。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协会
www.chinawriter.com.cn
本刊与中国作家协会合办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研究

刘保昌

重塑“楚狂”——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经典性意义

作为一位文学多面手,熊召政曾尝试过多种文体的写作,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最早以政治抒情诗写作成名的他,1979年一鼓作气写成了诗作《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作品甫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诗作有一个副标题——“致老苏区人民”,表露出作者要以诗歌为人民伸张正义、替他们“鼓与呼”的创作意图。在诗集《南歌》《魔瓶》《在深山》《为少女而歌》《瘠地上的樱桃》之外,熊召政还出版过散文集《禅游》《千古风流》《历史的乡愁》《溪边小牧童》《灯花带梦红》《醉里挑灯看剑》,报告文学集《太阳家族》《东方功夫王子》等。不过,在众多文体中,熊召政最为钟情的还是小说,他曾创作出版过长篇小说《霸王》《梅花胡魁》《酒色财气》等。关注现实人生、探寻世道人心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然而,这些富有生活气息、贴近日常人生的作品却一直没能受到足够的关注,直到熊召政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在历经了商海沉浮,阅尽人世沧桑,走遍大江南北,游历名山巨川,精研百家典籍,揣摩三教九流之后,熊召政退回书斋,以“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创作出14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并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在先前的诗歌创作中,熊召政反复锤炼过的语言表现能力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有效继承。小说的叙述语言亦庄亦谐,清丽雅正与谐趣讽刺交相辉映,充满张力和韵味。历史小说能在符合当下读者阅读习惯的现代白话文叙述中自然地带出浓郁的古风是殊为不易的,这可视为熊召政成功的审美性创造。

由《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四部构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描写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联合明神宗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司

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共同扳倒首辅高拱,柄国十年间主持风雷激荡的万历新政,全面实施改革,扶朱明王朝将倾之大厦,挽神州大地既倒之狂澜,功业赫赫、圣眷优渥,隆庆归天不久后却落得“家产尽抄,爵封皆夺”,人亡政息、地覆天翻的历史全过程。小说结构明晰,四部作品分别对应着掌权、固权、使权、失权四个阶段,极权政治中的权谋文化成为了小说描述的重点。是一部“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何镇邦语)的具有恢弘史诗气象的历史小说。

《张居正》最突出的美学贡献是重新塑造了张居正具体而生动的“楚狂”形象。小说主人公张居正系明代荆州府江陵县人,因其家乡位于故楚大地的腹地,故其人亦有“张江陵”之别名。作为张居正的“乡党”,熊召政在写作中自然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地域认同和情感代入。他曾说过,“楚狂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无疑是个性鲜明、光芒四射的一位。”作为首辅的张居正的“狂”明显不同于楚国历史上“原生态”的“楚狂”,如“问天”的黄绾和屈原。“歌而过孔子”的接舆,又如以“凤歌笑孔丘”自命的大诗人李白等。张居正的“狂”在骨,是一种内敛的狂傲。熊召政认为,张居正“能够纳‘狂’于‘制’,‘狂’于内而‘谨’于外,‘洪水滔天’却并不决堤千里,这是他成功的理由之一”。此处无疑采取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与“原生态”“单一向度”的“楚狂”相比较,张居正是发展了的、综合性的、多向度的“楚狂”。

小说在广西匪患猖獗、隆庆皇帝突生妄症的朝野双重危机中开篇。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二人曾经是联手推翻前朝内阁首辅严嵩的“盟友”,但曾经风雨同舟的“盟友”一旦进入内阁成为“同僚”,便会受到多方利益的牵制,其政见往往并不相同,因此种种冲突也就

在所难免。如高拱对其座下门生、两广总督李廷有心偏袒,张居正却极力主张撤换这位剿匪不力的草包总督,于此表现出人物超出庸常的“知人之智”。张居正认为,“李廷心存政府,遇事实报,这是优点。但此人实非军事人才”,既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不能胜残去杀,诛凶讨虏。因此,张居正极力推荐虽有贪鄙成性之名声,却“心狠手辣,大有方略”的殷正茂出任封疆大吏以平定广西庆远之匪患。小说中又写到,隆庆皇帝之所以患上不治之症,直接原因是掌印太监孟冲引诱皇上偷出紫禁城,在帘帘子胡同同时得上了杨梅大疮,而孟冲就是由高拱推荐任用的威权赫赫的“内相”。

可见,此时大明王朝国库空虚、吏治腐败,匪患不已、内外交困。张居正空有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但首辅高拱已将这位比自己年轻13岁的次辅视作强劲对手,步步安排“灭顶”陷阱,处处暗藏刀光剑影。张居正于是只能将“狂傲”深深隐藏,韬光养晦待时而起。“善于等待”是英雄豪杰成长的必备“技能”。张居正“城府甚深”,喜怒深藏,善于忍耐和退让以避锋芒,其做事却又能曲折迂回、坚韧执著,而这正是白居易所称赞的“大丈夫”。

小说生动细致描写了张居正与高拱在广西平匪、王真人逞凶、舍利珠辨真假、李廷行贿等重要事件中机关算尽的争斗过程,再现了张居正“上位”后开启“万历新政”,为国为民不惧个人牺牲的博大情怀。在与户部尚书王国光、山东巡抚杨本庵讨论以山东为试点进行的“清田”改革时,张居正亦慷慨陈辞:“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虽陷阶满路,众箭攒体”也绝不后退。“楚狂”的性格特征于此得到充分彰显。张居正通过“京察”“考成”方式整顿吏治,以胡椒苏木折俸,借“子粒田”征税扩大财政收入。他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勇猛

精进;他清查田亩,抑制豪强,实施“一条鞭法”,不惜得罪“巨室”、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为推动全面改革,“铁面宰相”常行霹雳雷霆手段,果敢无私。如其下令拆除荆州知府赵谦为他歌功颂德修建的牌坊,公开其父赵文明接受他人赠予的一千二百亩良田的事实,将管家游七的亲戚孟允仇连降两级发配云南等等。小说将这个始终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楚狂”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明史·张居正传》中赞其“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其性格“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评价其为人“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指出其为政核心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小说详细地描写了张居正“楚狂”性格的生成、发展及演变过程,在张居正早期与首辅高拱斗争时,他处处采取“守”势,步步为营、韬光养晦,无论是与冯保交好,还是向李贵妃靠拢,用的都是“阴谋”。当上首辅后,张居正开始以“露勇”手段实施全面改革,通过“京察”打压政敌,实行考成法,罢省“冗官”,通过减免田赋、改革税制等,战胜政敌,杀伐决断,手段铁腕、气势逼人,其行事转为“阳谋”,飓风过冈,百草尽伏。等到威权确立,在“夺情事件”和“回荆州奔丧”的过程中,张居正从容镇定,将清流名士和各路政敌“玩弄”于股掌之中,走上了专权的巅峰。正是在这种权力发展“三部曲”的书写中,小说完成了对张居正“楚狂”性格的塑造。

正所谓“成也楚狂,败也楚狂”,小说并没有隐讳张居正的性格缺点:他为了驱逐高拱不择手段;为了“上位”讨好李太后没有底线地一再妥协;结交内相冯保不惜纵容其贪鄙行径;南归葬父时乘坐三十二抬大轿,一路招摇;杀害学者名士伺心隐,禁办书院、废除讲学、钳制清流之口并实行文化专制;他亦独断

专行、党同伐异,曾经为其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循吏金学曾、李顺等人也先后弃他而去……《明史》本传中称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这直接导致了原先与其同一阵线一众干将的背离。张居正在接受名将戚继光赠送的两名妖艳胡姬后,耽于声色享受,精力衰退、沉痾不起,于壮年病逝,亲手葬送了其新政伟业。小说在“天香楼上书生气”一章中借张居正的湖广同乡艾穆之口,对“楚狂人”之缺失和“不幸”作出了评价:“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许圉师的女婿,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敝乡的不幸。但若具体说到当今首辅,楚狂人他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申韩之学,法峻义薄,长此下去,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这是对“楚狂人”的负面评价,从文化构成来看,可以说“楚狂”是儒家、道家与法家的综合体,与原生态的孔孟儒家有鲜明反差,带有浓郁的弥漫于故楚大地之上的千年悲情。

进取和狂放是“楚狂”性格的一体两面。敢作敢为是张居正锐意改革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可靠保障,而他的任性专权也为其身后的命运陡转埋下了伏笔。王先需在《历史小说作家的历史观》一文中说:“熊召政写的《张居正》,敢于揭示主人公在激烈政治斗争中公德和私德的冲突,突出人物异乎寻常的抉择,把从大处着眼的历史观与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寓客观的褒贬于冷静的描绘之中,在历史小说人物塑造上开了新生命。”的确,一切成功的历史小说首先必然应取得人物艺术形象塑造上的成功。在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像长廊中,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形象,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和高峰。